

原先的服饰

我祖籍广东,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,是第三代日本华侨。虽然生长在异国,但是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在内务部的安排下,我到了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的服装鞋帽样品加工厂做设计师,进行服装、鞋帽的设计。当时,政府考虑到北京现代化发展的需要,从上海迁来了一批老师傅,有理发的、做服装的、做西餐的,等等。我回国的时候,正好他们也到北京。就这样,我和几十个上海来的服装师傅,被安排到了一起。

我在海外的时候就听说,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,男女平等,女人可以从家庭走向社会,同样是国家的主人。我非常羡慕,因为在日本,多数女人一辈子只能做家庭妇女。中国既然是这样一个国家,自己不正正好可以塑造新中国的妇女形象吗?

当时,代表中国女性新形象的服饰,比较典型的是军绿色的列宁装。这是从解放区来的知识女性的普遍穿着,女学生也都爱穿。但是在我看来,这像是男人的衣服,因为列宁装太大,对苏联或美国女人的体型来说比较适合,但中国女性相对瘦小,穿上后一点都没有新中国女性的感觉。对于我这个在国外接受过专业学习的人来说,从美学角度看,它既不体现大家闺秀的气质,离现代女性的风格也太远。然而,中国女人普遍非常羡慕这种装扮,因为它是先进的符号。

夏天则是卓娅衫,大圆领、前胸很多褶子,下身是肥大的裤子。当时,我们国家又引进了苏联老大家的连衣裙样式,这就是一度推行的布拉吉。苏联老大家的胸部大,腰很粗,臀部也特别宽,所以布拉吉的领口设计得很大,图案都是大红大绿的大花。为了引导“时尚”,当时我们国家生产了一大批这样的服装。

这样一种大妈风格,在当时的

为新中国女性设计服饰

◆ 陈富美 口述
高芳 采访整理

1956年,我和我的先生一起,响应周总理的号召,回到祖国。那时我刚刚21岁,充满着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与热情。我在日本学的是服装设计,一心想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所学改善中国人服饰、塑造中国人的新形象。

中国却很前卫。在用纱布裹胸、外面再严实地上背心的年代,中国女性都羞于暴露曲线,加上布拉吉的艳丽图案,许多人想穿又不敢穿。

还有一种是自己做的徼徼小褂,是当时家庭妇女普遍穿的。颜色一般比较暗淡,大都是灰、蓝或黑,素小花。当时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,结婚了就不能再穿鲜艳衣服,穿得漂亮被认为是舞女、是“不正经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,最美的是四合院里的老奶奶。我1957年住进内务部街,工作之余,常常见到大胡同里三三两两的老奶奶。她们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一些传统习惯,出门时非常讲究礼仪,过年过节全套的黑色:大棉衣、大棉裤,小腿用黑色绑腿布裹着,小脚上是穿绣花鞋……头上戴金丝绒太太帽,镶有绿色的宝石,个别还戴着耳钉,说话轻声细语。夏天拿着芭蕉扇,微笑慢走,她们的幸福,不张扬,但足以表露出来了。

美的新气象

作为设计师,我开始按照自己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理解进行设计。我当时想的是,列宁装是可以改造的,可以把国外的设计理念吸收进来。列宁装是军绿色的,我就设计了大方格的,因为中国女性比较

瘦,穿方格会特别显精神。而且当时方格在日本也很流行,这两个国家的女性,体型上有相似之处。我还用了一种叫毛蓝布的布料,颜色有一点像现在的牛仔服。还有服装口袋,当时中国人的口袋全是贴到衣服上的贴袋,但大格衣服贴袋的话很难对格,所以我就改成斜挖兜设计。扣子改成前面系扣,个别的设计成双排扣,这样如果怀孕的话,拿掉一排扣子,衣服就可以变肥接着穿。

夏天衣服,我同样设计得相对瘦、小,腰部下来15厘米,还没盖上屁股,袖子也是,刚盖上肩膀,领子是平领和无领。颜色上,我设计的是淡黄色底子装饰小黑点,或者是浅粉的、白色的底子配上小黑点,因为我觉得中国女性比较可爱,衣服如果是单色且又肥又大的话,显得发愣,带上圆点的点缀则看起来可爱而活泼。另外,当时布拉吉的库存很多,我也试着重新设计,把大而低的领子全拆掉,变小一点,肩膀再窄小一点。不少艳丽的布拉吉,配上了白色衣领和白色袖口后,最后基本上卖完了。

我按照自己的想法,刚一进入工厂就专心地画设计图。一个月下来,画了二三百张。厂长不懂得看图选设计,一个劲儿地摇头:“我们厂不卖画。”上海人懂一点:“这个图我可以裁出来。”厂长不懂我的“画”,那老百姓呢?我开始做市场调查。我拿着商业局局长开的介绍信,

每个礼拜天上午,到现在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三层的服装柜帮忙卖衣服,同时悄悄把设计图纸贴在墙上。

来这里的學生居多,因为她们没法自己买布做衣服,所以一般都会到卖成衣的地方看看。我记得当时有清华的,北大的,还有师范大学的。与柜台里摆满的军绿色列宁装相比,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对图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:“这个好!”“这个不行。”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,非常真诚。我记得非常受欢迎的点是毛蓝布、大方格,以及底色带黑点的面料。

有了市场的反馈,我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。我跟印染厂联系,当时许多现成的面料,淡黄的、白的,建议他们在这些积压的面料上印上黑点,推出来后,果然非常受欢迎。不光黑点,到了第二年,绿点的衣服也都有了。

我的设计也降低了成本。比如列宁装配有腰带,还有许多小扣子,工艺繁琐。加上肥大,用料也多。相比之下,我的工艺比较简单,衣服也变小、变瘦了,成本降了下来,可卖的价钱还是跟原来一样,利润自然比以前高。这下,厂长很高兴,他发现,设计师是有用场的。我设计的衣服不仅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很受欢迎,西单百货公司(现在的西单商场)、天桥商场、人民商场等当时北京的八大商场,都争先恐后到我们的样品加工厂下订单,我们忙得都

做不过来了。

我热切地投入到改变中国女性形象的努力中。然而,即便我们这些华侨是抱着艰苦奋斗的决心回国的,也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“一穷二白”。我记得工厂在大红门外,我的家在內务部街,路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,土路多,中间又经过很长的墓地,一下雨“蓝花”漫飞。因为语言不通,有时候晚上我要上夜班。9点钟夜校才完,就不回家了。可是,住集体宿舍更让人难过,晚上脱衣休息,国内的女工都是用肚兜做内衣,而我们六个日本来的,和当时的日本女性一样,已经在穿和今天一样的胸罩了,显得“格格不入”。

我的信仰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塑造中国女性新形象。当时,许多女性刚刚走出家庭,像我们工厂的女工,以前大都是家庭妇女,她们见了生人都躲着不敢说话。我发现,中国女性的包容程度是很大的,特别是对于美。虽然我戴胸罩的时候中国女性还在穿肚兜,但是,一旦发现胸罩比肚兜又方便又体面的时候,她们马上就接纳了。有一年,肤色府绸的面料在纺织厂大量积压,没人要又不能做衣服,我就进行设计做成胸罩,大概1000来件,两天就卖光了。

新生的共和国,虽然经济上落后、文化上落伍,然而,这并没有阻止住中国女性追求美的步伐。从旧社会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女性,充满了对美的向往与渴求。也正是她们对美的包容之心,成为我前行的动力。中国能有今天的时尚文化,最早就是我们这些服装设计师,和中国的女性一起,在追求美的动力之下,一步步地走过来的。

(摘自《纵横》2016年第10期)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37.重新回到美国学校上学

刚上任的时候司徒雷登踌躇满志,一心认为“中国人民渴望独立、统一、和平、经济复苏和民主的政府,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。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他们的国家,我关心他们的福祉,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,以及我深信他们的内战可以通过范围广、不受约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决。所以,我具有他们对我信任的充分优势”。可是经过努力之后他却发现,他根本就无能为力,只能无奈地表示:“对于处于这个巨大的争战、挣扎中筋疲力尽的国家,和遭受由此带来苦难、却又毫无力量避免它的各个阶层的人们,我感到心痛”。

特别让他伤心的是,以往他的学生对他是非常尊重甚至是敬仰的,可他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后仅半年,再回燕大,面对的却是学生对他的质疑。就在过去的校长官邸临湖轩,司徒雷登与燕大学生代表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时,学生反美反战的情绪强烈,气氛剑拔弩张,他所处的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,让他无可奈何地站到了自己最挚爱的学生的对立面。

1948年12月1日,傅泾波给周恩来、邓颖超、董必武写了这样一封信:

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三位先生大鉴:别后久疏音候,想念。现大局已趋近了结之日,信谨就日前与司徒先生谈话简录两点,与诸先生共研:(一)国民政府到如此田地,迷信武力,失却民心,希望诸先生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。(二)美国之所望中国者,为主权上能独立、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上能自由。今日举国渴望和平来临,弟亦翘盼能早日解决,即颂安好。傅泾波敬上

此信是按照司徒雷登的指令写的,经共产党驻香港的地下党转交至周恩来,信中透着万般无奈,亦可见司徒雷登当时的心情。

于此同时,与他同样失落的还有蒋介石。1948年年底的某一天,司徒雷登和蒋介石见

了最后一面。在蒋介石做礼拜的小教堂,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话,蒋介石离开教堂前握着司徒雷登的手,良久未语,最后叹息一声而离去。

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同样,从一个家庭的小日子也能看出当时历史的动荡和变革。

还是回到砖塔胡同。胜利后,傅泾波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,让他们重新选择学校。大姐暖冷已经上了辅仁大学,二姐铎若想学中文,而海澜和履任都喜欢英文,所以重新回到美国学校上学,上中学。

在美国学校海澜有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的朋友。一个叫小宝,女生。小宝其实姓鲍,父亲是东北人,当年曾是张作霖部下,海澜常去她家,为的就是她家的高粱米粥和高粱米饭,别人都嫌高粱米饭硬,咯嗓子,海澜却觉得香,百吃不厌。

一个叫赫尔曼,男生。其他的大名叫梁献章,但海澜是后来才知道的。赫尔曼的父亲叫梁秋水,是个报业前辈,创办了英文版的《北京日报》。梁秋水跟傅泾波是很好的朋友,两家经常走动,赫尔曼小时候就跟着父亲来过砖塔胡同,在海澜的印象中,赫尔曼胆子很小,总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,没想到几年不见,赫尔曼居然跟自己能成了同学,能说一句流利的英语,还长成了个小伙子。赫尔曼的母亲是夏威夷人,没什么文化,海澜曾经冒冒失失地问赫尔曼,你父亲学问那么好,怎么会找你妈这样的?赫尔曼看了海澜一眼,没作声。赫尔曼家住任史家胡同,放学后海澜常会跟几个同学去赫尔曼家玩,先把书拿出来,做好“伪装”,然后关上房门打扑克。梁秋水有时会推开门探进头来看一眼,这时海澜他们就赶紧把书拿出来盖在扑克牌上面,装作看书的样子。梁秋水是高度近视,戴着厚厚的镜片,根本看不清孩子们的小动作,见大家都在看书,点着头说,好,好!然后满意地轻轻拉上门,于是牌局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

上官云相的养女叫凯梯,也是海澜美国学校的同学。这个上官云相,既是参加上海淞沪会战的抗日英雄,又在“皖南事变”时奉命“围剿”新四军,双手沾满了新四军战士的血。他对这个养女十分疼爱,所以凯梯可以常常带着同学回家玩。

55.弄堂口风平浪静

小皮匠这才意识到,自己不知不觉钻入了别人的圈套。对方是有备而来,志在必得。这场比武还没开始,输赢已经定好了。即便第一回合打个平手,第二回合他也必败无疑。同和里弄堂口这块风水宝地要被别人抢走了。小皮匠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,趁人不备,猛地抽出扁担,心想撂倒几个是几个。还没等他把扁担抡起来,两只手已被人死死钳住,身体也被死死抱住了,颈部也被掐住了,动也动不了。胎记正色道:“愿赌服输。你反抗是没得用的。”

相持之中,鸦雀无声,都只在手上暗暗用力道。忽然,隐隐约约听到哪里传来呼啸之声,由远而近,中间好像还夹杂着马蹄的疾驰,踢踢踏踏。众人仔细分辨,是从弄堂里传来的,马蹄声是木拖鞋的声音,呼啸声却不知道是怎么发出来的,不禁都把目光投向弄堂里。只看见一个女人一只手拿了把马桶刷子,另一只手托了只空钵斗,一路呼啸而至。这个女人的叫声比绍兴大班还高亢激越,穿透力十足——

来的这个女人是广东嫂嫂。广东嫂嫂吸着一双木拖鞋一路狂奔,收住脚步并不娇喘吁吁,仍然笑靥如花,一开口,是带广东腔的苏北话:“有事好商量,先放开我老公。”小皮匠本来已经绝望了,看到广东嫂嫂从天而降,再听到这句话,如同电轰雷击一般,眼泪便下来了。那些人面面相觑:事先了解过,同和里的小皮匠只有一个儿子,没得老婆的,而且他人长得瘦小,胆子也小,容易拿下;哪知道突然冒出个老婆来了。再看看广东嫂嫂手里拿的两样东西,一把马桶刷子和一只小钵斗,一点都不搭调,忍不住便嘻嘻哈哈地笑起来,笑归笑,依然按着小皮匠。广东嫂嫂说:“乖乖,倔强的嘛。不放手是吧?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”那些人听了这话,笑得更厉害了。这样的话,从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女人嘴里讲出来,显得特别滑稽。广东嫂嫂也笑了,一边笑,一边用马桶刷子东戳一记,西戳一记,转身的时候或用小钵斗在谁的腰上轻轻一碰,身姿十分轻盈优美。那几个家伙只觉得一阵酥麻,笑还在笑,身子却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了。

江水英出摊比小皮匠晚,太早,也没有人

来剃头。这天走到弄堂口,正看到小皮匠被几个大汉团团围住。毕竟都是扬州来的,同气连枝,江水英心里叫了声“乖乖没得命喽”,放下剃头挑子,拔腿就跑,去搬救兵。等到江水英找到山海关路小菜场门口摆度匠摊的老阿哥,老阿哥再心急慌忙地把附近的小皮匠召集起来,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钟头了。十多个人,各人手里拿了榔头扁担,急如星火地朝同和里赶过来。远远看过去,同和里弄堂口风平浪静,不像是刚刚发生过战事的様子。赶到近前,小皮匠还是坐在原先的位子上,神态安详地在敲槌子,倒是旁边有七八个人坐在地上,每人手里一只碗,喜笑颜开地在吃甜酒酿。一个脸上有块胎记的傢伙说:“阿嫂手艺好,良心话,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酒酿。”

广东嫂嫂笑吟吟地靠在墙上看着那几个。她穿了一身碎花图案的睡衣睡裤,睡裤的裤脚接近膝盖,露出两截健硕光洁线条优美的小腿,脚边是几只装甜酒酿的小钵斗。比较醒目是广东嫂嫂脚上的那双木拖鞋。一般的木拖鞋都是白坯的,上面钉条帆布带。广东嫂嫂的这双木拖鞋不一样,底厚,还有后跟的,周身红漆印花,上面的带子也是镶花边的,当中还有只蝴蝶结,简直就可以用珠宝气来形容。广东女人别的不讲究,有两样东西必须讲究,一是讲究吃,二是讲究脚上的木拖鞋。广东嫂嫂听到胎记说了那句话,笑着端起钵斗,又给众人一人加了一勺酒酿。地上那几个人吃得心满意足,连声道谢。其中一个说:“阿嫂手艺好,人品好,功夫好,我们服服帖帖。”广东嫂嫂用一只脚去蹭另一只脚,姿态很好看,也保持得很平衡,那只空着的木拖鞋露出了色彩鲜艳的牡丹花瓣。还好是在这个场合,换个场合,很可能会以为广东嫂嫂在卖弄风情。广东嫂嫂说:“你们阿晓得我姓什么,哪块人?”那些家伙都摇摇头说不知道。广东嫂嫂含笑说:“不晓得才好呢,晓得了,我就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灭口了。”众人都大笑起来。小皮匠也被逗笑了。场面十分欢乐融洽。老阿哥和江水英对看了一眼,十分纳闷,不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。

明起连载《老人相亲角》

同和里

王承志

